

左玉河 主编
中华口述历史丛书

流亡

——抗战时期
东北流亡学生
口述

齐红深 编著

大象出版社

中华口述历史丛书 / 左玉河 主编

流 亡

——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口述

齐红深 编著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亡——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口述/齐红深编著.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8. 6

(中华口述历史丛书/左玉河主编)

ISBN 978 - 7 - 5347 - 4990 - 2

I. 流… II. 齐… III. 抗日战争 - 史料 - 东北地区

IV. K26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0986 号

中华口述历史丛书/左玉河主编

流亡——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口述

齐红深 编著

责任编辑 杨吉哲

责任校对 霍 力 裴红波

书籍设计 王翠云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网 址 www.daxiang.cn

发 行 河南省新华书店

制 版 郑州普瑞印刷制版服务有限公司制版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2

字 数 359 千字

定 价 36.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二环支路 35 号

邮政编码 450012

电话 (0371)63955319

序

杨晓

《流亡》是一部关于东北沦陷后知识分子流亡关内的口述历史。因编著者之邀,我有幸先睹为快。阅读之际,我不仅被这部书的内容所深深地吸引着,更被编著者工作的艰辛所强烈地震撼着。我真的难以想象,编著者是怎样在财路枯竭、工作繁重、身心疲惫的情况下,坚持工作了十几年,完成了这项庞杂琐碎的工作,并最终使它与读者见面的。我钦佩编著者为此而忘我的工作精神,是因为我知道自己真的难以做到。

据我所知,在国内殖民地教育口述历史研究领域,齐红深研究员可以称得上是第一人。正是他的努力、他的奋斗、他的拼搏,从实质上减少了我们这一代人,“眼睁睁地看其流失,内心所发出的深重的使命感和遗恨、惋惜之情交织,而又无能为力”^①的缺憾。他的以《流亡》为主题的口述史研究,将慰藉着所有深受日本侵略战争之苦的已故东北流亡知识分子的在天之灵,也为中国抗日战争历史书写了真实、深邃、凝重的一笔。

这部口述历史的采访对象年事很高,身体状况较差,经历复杂曲折,特别是他们那段痛苦的流亡经历在记忆之中挥之不去的情愫,是很难被他人所深刻理解的。齐红深研究员是如何移情的,又是怎样与这些痛苦的心灵共鸣的,是我深入思考的问题之一。关于这一点,他本人是这样说的:“现在许多人已经无法理解那一段历史,也无法理解这些亲历者对历史的诠释。我们课题组里那些比较年轻的成员,对于亲历者的回忆也时常困惑不解。但是,我们努力把受访者讲述的历史忠实地记录整理出来。我们在调查和研究过程中,也曾感慨万千,多次按捺不住冲动,渴望从历史中站出来直接发言。但是,经过多次反复考量,我们最终还是选择了述而不作和缄口沉默。”

对他的这种想法和做法,我极为赞同。我曾参与指导研究殖民地教育史的研究生。年轻的学生对那段历史理解上的困难,以及他们与我们在理解上的差异,我是了解的。我认

① 唐德刚:《史学与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为《流亡》一书,以青年人了解那段悲惨的历史为目的,为此,尽量消除由于代沟造成的认识上的困惑是不容忽略的。作者不想通过直接发言的形式对年青一代进行说教,而是力求通过真实的历史记忆,让年青一代去体会和感悟。如此解决历史研究中的代际关系问题,是难能可贵的。作者按捺住自己的冲动,是为了让位于口述者的冲动,因为后者的冲动更接近历史的真相,更易于感召人们对于那段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

我的一位研究生曾参与过齐老师主持的采访工作。一位年事很高的被采访者因为激动、兴奋,在还未及最后进行录音和录像之时,不幸突然去世了。他激动、兴奋的是终于有人在他的有生之年,来听取他这段鲜为人知的经历,珍视他的这段经历作为历史记忆和历史教育的价值了。他的突然去世,给家人带来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家属却默默地承受着,没有对采访这一诱因表示一丝一毫的抱怨。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顺应了自然规律,而是因为他们深深地懂得,逝者最后生命的冲动与抗战历史记忆交织在一起,迸发出的生命火花将点燃其他人生命的光焰,体现了逝者的一种至高的人生境界。我一直对此事念念不忘,心想:又有多少人能企及这样的人生境界呢?我就是这样被带入抗战时期东北流亡者口述史研究的情结之中的,并由此理解《流亡》的问世,所形成的口述者的冲动与作者的冲动之间的共振关系,理解了作者的移情与年轻人移情可能性的关系。

美国历史学家贝克尔将历史定义为“说过和做过事情的记忆”。从理论上讲,“口述历史正是建立在回忆的基础上,它力图通过回忆来获得关于过去事件的丰富证据,从而记述回忆者自己的历史”。编著者认为殖民地教育口述历史“仅仅是潜藏在亲历者心中的历史记忆——这是随时都可能逝去并将永远不能再生的文化遗存”。要保留下来,必须进行口述史研究。从方法上讲,“口述历史是将历史与记忆的关系具象化和方法化,将历史对于记忆的依赖性引入历史研究的实践操作中”。编著者正是这样实践的。他认为,“历史是复杂的,立体的,丰富多彩的;而我们自己还是很浅薄的。我们能够把即将散失的历史记忆收集起来,就应该知足了。我们应当老老实实地把亲历者本人的历史记忆原原本本地呈现给读者,呈现给现实与未来的世界”。它“会比档案记载更真实、更全面、更生动”^①。

通过编著者运用口述史研究抗日战争历史的动机以及对口述史的方法及其价值的认识,可以实证“记忆”作为口述史的一种本质要素,是口述史研究的立论基础。口述史研究既以记忆为工具,又以记忆为内容,使历史研究发生了一种特殊变化,这就是将心理与心理学纳入历史研究的范畴,其心理意义也得以凸现。正如西方学者所表述:“对记忆的实际体验证明,过去曾经存在,也因此激发重构过去事件的努力,甚至产生非做不可的冲动。”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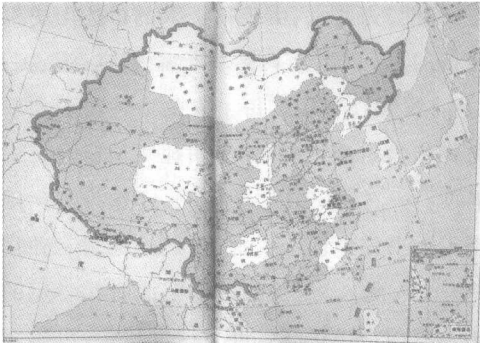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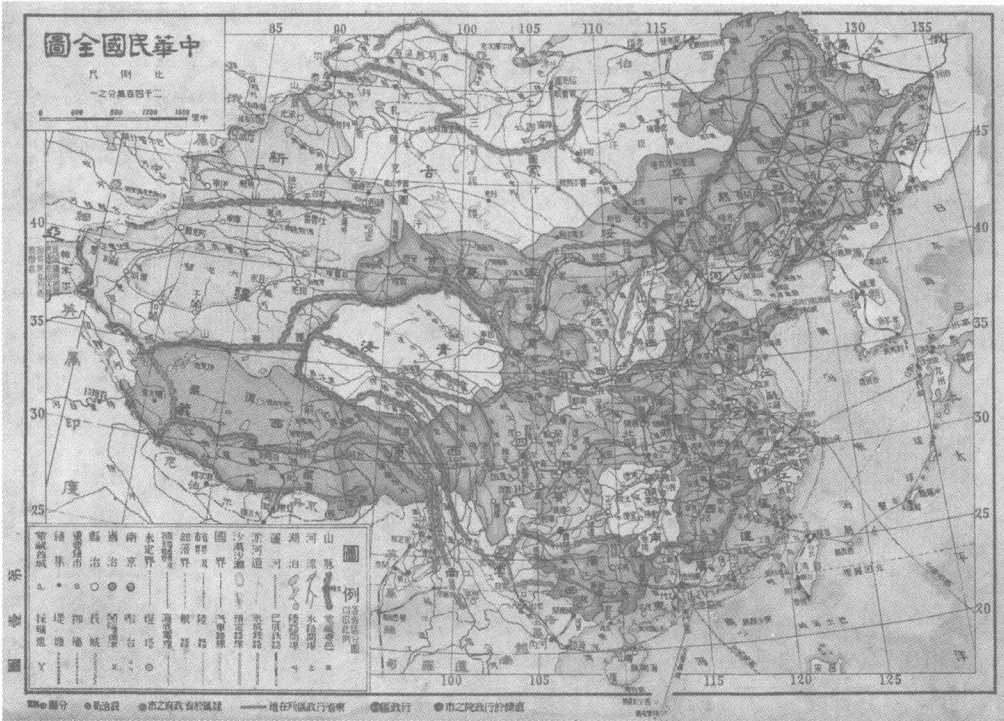
^① 齐红深:《日本侵华殖民地教育口述历史研究报告》,《抹杀不了的罪证——日本侵华教育口述历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6~24页。

有心理因素介入历史研究之中,历史才能真正地活化,我们才能通过口述史,看到活生生的历史,看到历史研究者活的灵魂,看到历史研究的生命价值所在。

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之后,千千万万不愿做亡国奴的知识分子流亡关内,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历程。流亡本是中华民族遭受异族侵略国破家亡之时的被迫行动。经济的困窘,生活的艰辛,环境的残酷,民族、国家前途的渺茫,对生命和幸福的渴望,本已使年轻的生命遭受难以承受的压力,民族内部的争斗更使他们无力决定自己当时和今后的命运。即使在老年,当他们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回首往事,仍然无法摆脱难以言状的羁绊,痛苦地折磨着他们的心灵。这是中华民族抗战历史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脍炙人口的《流亡三部曲》就是这段历史的生动艺术写照。但是作为历史,却很少有人正面而深入地研究它,更是缺少齐红深先生这样的实证研究。《流亡》作为史料将与抗日战争文献资料互补。几十位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的经历反映出了日本侵略给青年学生的思想、情感、生活、学习、命运和伦常关系所带来的变化。虽然他们极力抗争,但是在国家、民族命运的危急关头,也往往难以把握自己的前途。本书深化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及其之后的命运变化、心理影响这一主题。我们从中看到,战争所造成的物质损失与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心理伤害相比,真的是微不足道的。这部著作正是通过真实的人生经历,引起人们心理上的共鸣,启迪人们的思考,从而激励人们反对战争,追求和平,保卫和平,为和平而奋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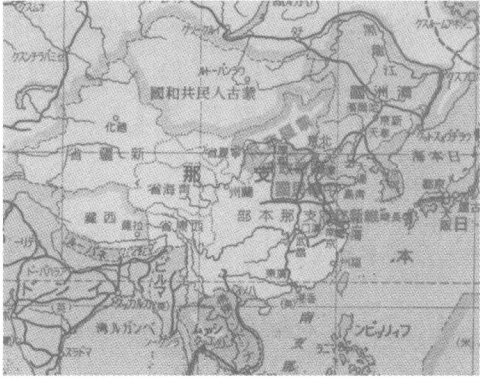
在编辑体例上,齐先生以脍炙人口的《流亡三部曲》为线索,由于每个人的口述历史都是相对独立的,每个人的经历又是十分丰富和曲折的,编著者为了节省篇幅,根据《流亡三部曲》的逻辑关系,按照“松花江上”、“离家”、“上前线”的顺序,将每个人的口述历史加以剪裁,使全书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书前的《东北青年学生流亡史略》简明扼要地概述了史实,交代了历史背景,使读者对史实有一个总体的了解。《我来自北兮回北方》作为尾声则将抗日战争结束后流亡者的归宿整合到一起,使得全书完整而引人深思。经过编著者独具匠心的编排,读者所看到的,不再是每位流亡者的个人史,而是抗战时期东北青年学生的流亡史,从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史、苦难史、屈辱史和斗争史。可以说,《流亡》以丰富而错综复杂的史实和当事人的深刻反思再现了那一段撕心裂肺的往事,真实地展示了抗战流亡的生动历史,反映了中国抗战大后方的社会状况和青年知识分子的内心苦闷与追求。这是一部内容浩瀚、可以从多个角度解读的著作。我相信,每位读者,不管年长还是年轻,不论政治派别和种族肤色,都会受到感动,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2006年5月写于大连,12月修改于日本东京大学



中华民国全国(商务印书馆《中华分省地图集》1932年2月印行)

中华民国全国(1936年)



日本侵略下的中国(《东亚现势大地图幅图》,日本东京朝日新闻社1938年印行)

前言

抗战时期东北青年学生流亡史略

齐红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这首满怀离乡之思、国难之痛的悲歌,真实地反映了东北沦陷之后,无家可归、流亡离散的东北人民的悲惨遭遇,深深触动了每个中国人的心。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学良率领东北军主力驻扎在平津一带。从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起,沈阳的东北军政旧部、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等就纷纷逃往关内。1931年底,流亡到平津一带的东北学生就有万余人。此后,又有许多东北学生和民众不甘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压迫,陆续以各种借口逃往关内。到1934年初,流亡入关的东北学生达三四万人。七七事变前,流亡关内的东北人有四五十万之多。他们背井离乡,满怀国仇家恨,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重乡土讲义气,同时也因张学良“不抵抗”和西安事变的原因而受到一些人的误会和歧视。他们虽然政治信仰不同,但无家可归的命运是相同的,都具有赶走侵略者、打回老家去的强烈愿望,因此形成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和社会阶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在沦陷区中,东北四省沦陷最久,又是日本侵略者的产业中心和屯兵要地,我们应当加紧那里的地下工作。对于流亡到关内的东北人民,应当加紧团结他们,准备收复失地”^①。周恩来和董必武也多次指出,只要东北救亡总会的牌子存在,东北就很难被出卖。而在流亡到关内的东北人中,青年学生是最年轻、最富有生气的。

关于抗日战争的史料和著作虽已不少,但关于东北流亡学生的研究成果甚为缺乏。仅有的论文主要依据政协文史资料刊登的回忆录,侧重反映东北流亡学生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这一个方面,而且下限仅止于七七事变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我在进行日本侵华殖民地教育口述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得到大连枫叶教育集团和中国近代口述历史学会的经费资助,组织专家学者对东北抗战流亡人士进行了抢救性采访。可惜的是为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7月版,第990页。

时已晚。当年的五十来万东北流亡人士在世者仅有少数当时处于青少年的学生而已；当年十来万东北流亡学生，我们所能找到的也仅有 68 位！在这 68 位幸存者中，身体、神志尚可以接受采访和本人、家属同意接受采访的仅仅只有 50 位！在这 50 位老人中，18 人仅能述及大概，内容不够具体；8 人又在访谈中途不幸去世，有的问题未来得及深问。我们的采访工作是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也是在悲愤、惋惜、感动、愧疚等复杂的心情下进行的。所以，正像本书的内容不可再生一样，本书的许多遗憾也是无法弥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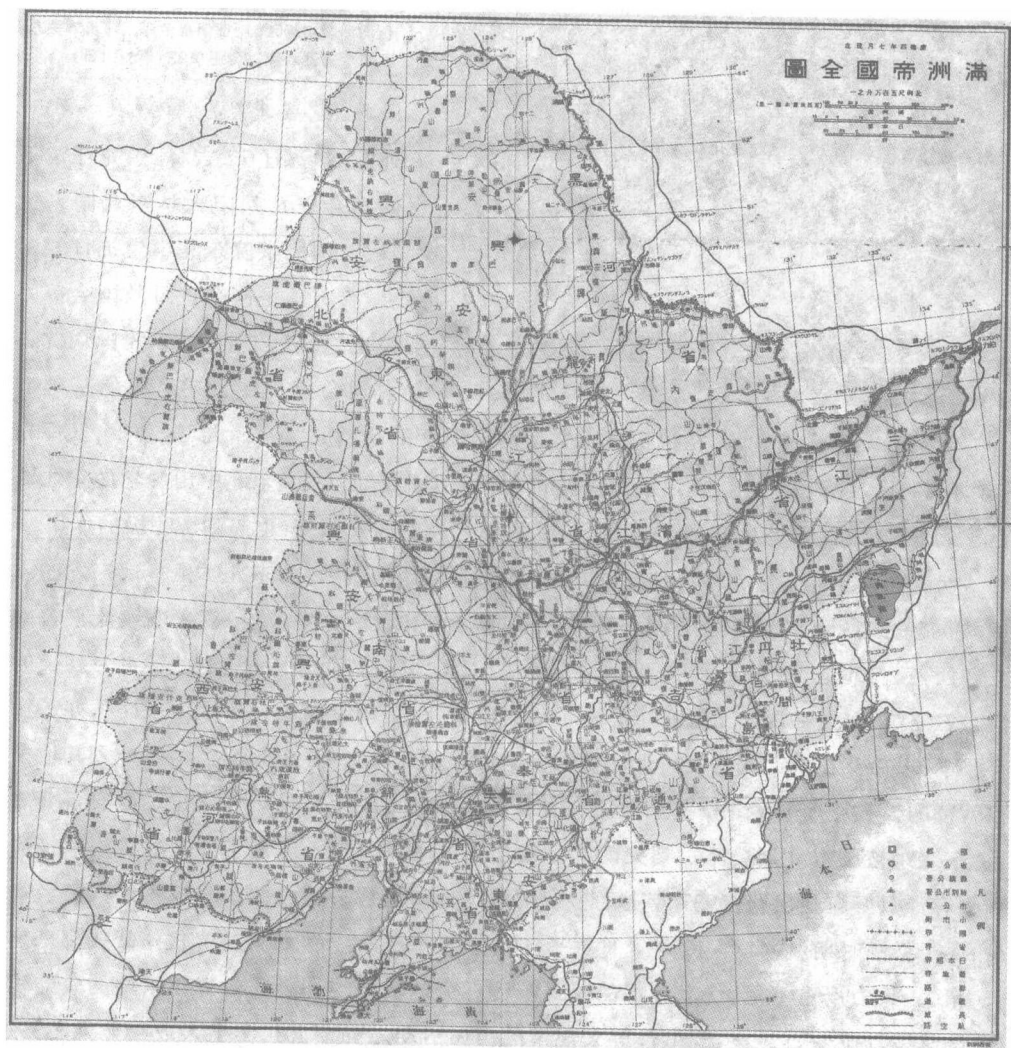
由于口述历史是当事人站在自己的独特角度对所历、所见、所闻、所感进行主观性的叙述，为了使读者能够对东北青年学生的流亡历史有一个总体的把握，能够把每篇口述历史从各自的角度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使之收到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之效，我们根据有关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整理出此文，以清全书之眉目。

一、东北学生流亡的过程

东北流亡关内的青年学生，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 1931 年、1932 年最为集中。东北大学、冯庸大学等校学生虽然自行前往，但基本上是在有组织的情况下结伙结伴而行的。他们进入关内之后，积极参加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等组织的抗日救国活动，也受到了全国人民和有关方面的欢迎和接待、安排。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政机关和其他东北上层人士，在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下，为收容安排流亡学生尽了许多努力。除东北商船学校迁往天津外，东北大学、冯庸大学、东北交通大学、东北讲武学堂等，都借读在北平其他大学内。九一八事变后被掳去日本逃回来的冯庸积极组织冯庸大学义勇军参加长城、淞沪抗战活动。1932 年 2 月东北大学复校后，冯庸大学、东北交通大学先后并入东北大学。流亡关内的还有一部分是中学生和随同家人的儿童。如何解决流亡的东北中小学生学习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后，为使逃亡进关的东北青少年学生能继续读书，先后开办了由王化一为校长的东



日本在东北遍设岗楼。刺刀、狼狗、鬼子兵——日本侵占东北14年给东北人民留下的历史记忆



北学院(后来改为东北中学)和李梦兴为校长的东北难民子弟中学,由当时流亡关内的教师任教,一面组织教学,一面进行军事训练。同时,流亡到关内的齐世英、周天放、高惜冰、臧启芳等东北籍国民党人士,多方奔走呼吁,由国民政府行政院一次拨给约5万元,在北京设立了第一所国立中学——中山中学。同时还先后设立了行知中学、念一中学,积极收容东北流亡学生。流亡到关内的东北青年学生,起初主要集中在这些学校里。

伪满洲国地图
(1937年)

东北流亡学生,是最早打起抗日救亡大旗的一支革命力量。1931年9月21日,3500余名流亡到北平的东北学生举行集会,宣布成立东北留平学生抗日救国会,并通电南京国



伪满洲国实行帝制。傀儡皇帝溥仪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等合影(1934年3月1日)

民政府,要求“立息内乱,一致对外”。随后,辽宁、吉林、黑龙江留平同学会以及朝阳大学东北同乡抗日会、国民学院东北学生抗日救国会、吉林留平同乡抗日救国会等团体也纷纷宣告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正是在上述组织的基础上

由王化一等人联络成立的。在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新的高潮的“一二·九”运动中,发挥先锋作用的是东北流亡学生,表现最为积极和勇敢的也是东北大学、东北中山中学的东北流亡学生。东北流亡学生对于促使张学良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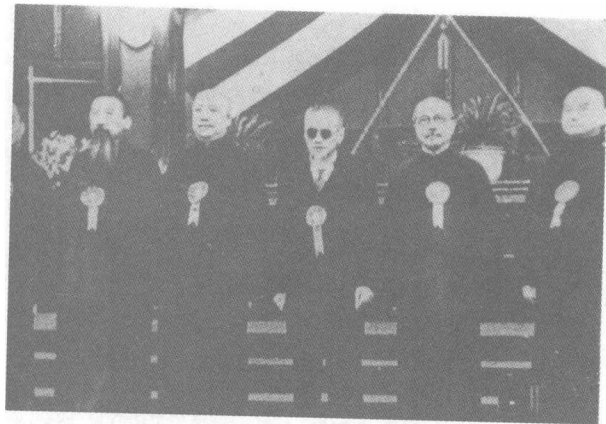
伪满洲国建立之后,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统治日渐严密,流亡的东北学生呈现自发的零星的状态。1935年华北形势吃紧,东北在关内的势力和政治派别被迫南移,陆续流亡去南方和西南、西北地区。东北大学、东北中学、中山中学也辗转西移南迁,走上了更为漫长的流亡之路。车向忱在西安不忍心东北军子弟流浪街头,借用废旧的厂房因陋就简举办了竞存小学,以后又在共产党的支持下增办了中学部和职业教育部。东北流亡学生升入其他学校就读的人数逐渐增多。一些东北流亡青年从军参战或走上其他工作岗位。西安事变之后,东北军被肢解。因此,流亡到关内的青年学生在平津一带已经没有公开的机构来接应和收容,只好自找出路。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自动流亡去关内的东北学生人数已经很少,属于低潮时期。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线越来越长,精力、兵力严重不足,伪满洲国的殖民统治者穷凶极恶地加紧了对青年学生的残酷镇压,陆续发动了“一二·三〇”事件等大规模的镇压活动。这时,流亡学生人数明显增多,一些东北进步青年纷纷逃往关内,寻找出路,投奔抗日斗争。虽然其中有些学生逃往关内时相互之间有某些联系,但已经不再像九一八事变之初那样成规模和比较地有组织有联系。这一时期,在东北沦陷区从事地下工作的国民党、共产党和群众自发的爱国组织开始活跃,他们对东北学生入关起到了启发、引导的作用,华北地区也建立起几条秘密的联络线路,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也成立了“战干团”、东北青年接待站等机构,接待、收容和教育从东北来的青年。

东北流亡学生中还有另外两部分:一部分是九一八事变之前在关内上学的东北籍学生,主要分布在北大、清华、南开、中央政治学校等校,其中仅中央军校就有二三百人。在东

北沦陷后,他们有家难归,深感亡省丧家之痛,是最早投入到抗战救亡热潮中的热血青年。另一部分是,华北的汪精卫伪政权建立之后,日本殖民统治者为了推行“日满华亲善”反动政策,伪满洲国“官方”陆续选派少数学生到关内上学,同派往日本的学生一样称作“留学生”。由于日本在关内的统治比东北松散,其中的一些学生进入关内以后,受到全民抗战热潮的影响,虽然本人不像其他流亡学生那样有生活、上学之忧,但在心理上也不不同程度地形成国破家亡的民族认同感。

东北流亡青年学生是东北流亡人士的一部分,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国破家亡深受苦难的缩影。他们的生存状况和思想精神面貌虽然各自有所区别,但从整体上来说,生存、求学、抗日救亡、徘徊苦闷,是东北流亡青年学生所共同面临的主要问题。当时国

际国内形势和矛盾十分错综复杂。一方面,民族矛盾、国家存亡是主要矛盾。但是东北流亡学生中的大多数并不处于抗日斗争的前线。在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残酷侵略战争之中,他们也感受到生活物资极度缺乏,学习条件极为艰苦。另一方面,即使在国民党、共产党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后,依然是充满了思想路线、主导权和利益的争斗,东北流亡学生往往成为国内不同政治势力争夺和影响的重点。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前两种矛盾以派别、地域形式的反映和表现,也对东北流亡学生造成直接的影响。那就是东北流亡人士之间以及东北人与关内人之间,也时有误会、矛盾和冲突。所以,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生存矛盾和思想斗争、派别斗争等一系列错综复杂、明争暗斗之中,作为满腔热情、思想尚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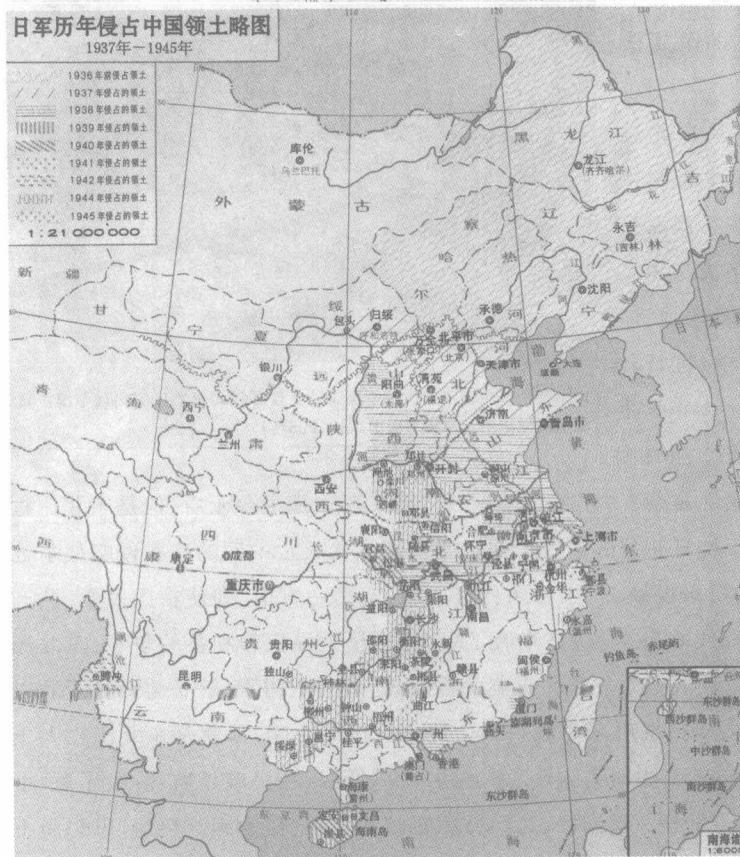
北平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主要汉奸头目(1937年12月14日)



南京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主要汉奸头目(1940年3月30日)(《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5年)



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区域图(1939年9月—1945年8月)及伪政府主要头目



日本历年侵占中国领土略图

成熟的青年学生,他们所承受的压力、苦难和矛盾,其深重程度是难以想象的。

二、收容东北流亡学生的主要学校

据1943年秋东北青年教育救济处、东北大学毕业生服务咨询部调查,东北大专以上流亡学生除东北大学比较集中外,分散在30多所大学,大约790人(男623人,女167人);中等学校学生除东北中山中学(360人)、国立十八中学(302人)比较集中外,分散在80余所学校,计1171人(男727人,女444人)。1943年12月,东北流亡学生踊跃参加出国远征军,其中东北大学24人,国立十八中学三四十人。^①这里,对收容东北流亡学生最为集中的几所学校加以介绍。

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是以“欲使东北富强,不受外人侵略,必须兴办大学教育,培养各方面人才”的宗旨,冲破日本的阻力,于1923年4月在沈阳成立的。由辽宁省代省长王永江任校长。1928年8月,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长张学良继任校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一夜之间占领沈阳。日本南满公学堂堂长来校,伪致慰问,劝照常上课,称经费由日本供给。全校师生悲愤已极,严辞拒绝,被迫走上流亡之路。1931年9月26日东北大学大部分师生迁往北平,教授们组织“教授代表会”,推动学校复校事宜,学生也成立了“东大临时学生会”,协助教授们工作。10月18日,学校借北平南兵马司旧税务监督公署为校舍,勉强复课。因条件所限,安排在北京大学等校上课的部分学生没有回来读书,仍然保留学籍,部分系科停办,同时增办边疆政治学系、家政系等实用学科。

1933年2月,教育学院院长姬振铎辞职,方永蒸继任。3月,张学良校长出国。宁恩承秘书长、代校长辞职,北平政务委员会委任王卓然为东北大学秘书长,代行校务。刘百昭院长辞职,聘曹国卿为文法学院院长,兼代理交通学院院长。6月,流亡北平的冯庸大学、东北交通大学并入东北大学,其所占原陆军大学校址,由国民党的军委会拨为东北大学总校校舍,彰仪门校舍为第一分校,南兵马司校舍为第二分校。7月,学校第五届学生231人毕业。9月,国民党政府中央财政部根据宋子文关于拨给东北大学补充经费的提议,并据行政会议通过的议案,开始按月拨款2.5万元,学校恢复招收新生145人,并初设补习班,招生180人。外国文学系改为边疆政治学系。哲学系、物理学系、建筑学系和公民史地专修科停

^① 见东北政务委员会编印:《东北要览》“教育及文化事业”,民国35年出版。

办。10月，重组东北大学委员会，经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指令备案的东北大学委员会成员是：委员长宋子文，副委员长张学良，执行委员王克敏、王树翰、刘哲，常务委员于学忠、王卓然、王树常、李石曾、何应钦、周作民、胡适、张伯苓、黄郛、汤尔和、宁恩承、万福麟、刘尚清、蒋梦麟，委员于右任、孔祥熙、吴稚晖、吴铁城、沈鸿烈、陈公博、陈立夫、张群、张静江、章士钊、蔡元培、罗文干、肖纯锦、朱霁青、朱家骅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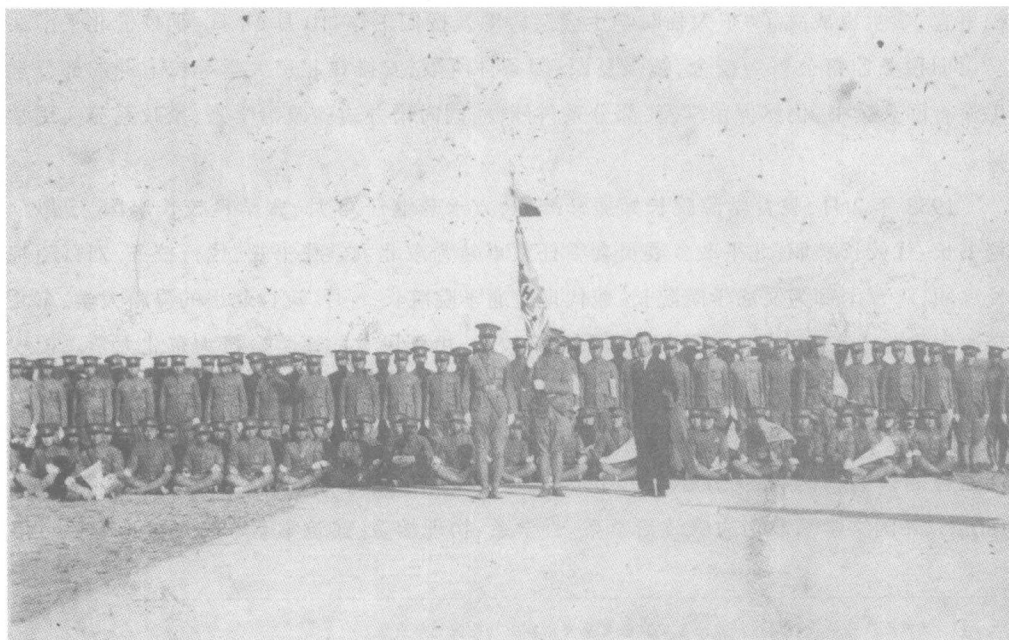
冯庸大学系由冯庸(1901—1981)以其家产于1926年创办于沈阳西郊。该校为“造成新中国的青年”，“以精神的锻炼和体格的养成为宗旨”。东北沦陷后，冯庸遭日寇逮捕，逼降不成，掳至日本。冯庸大学被迫关闭，教工和学生均转入关内。在长城抗战、淞沪抗战中，冯庸大学均组成学生义勇军前往。

东北交通大学校址在锦县(今锦州)，初称唐山交通大学锦县分校。为东北培养交通方面人才而设。张学良兼任校长后改名为东北交通大学。流亡关内后并入东北大学。

1934年4月，国民党政府训练总监部派潘佑强到北平，检阅专科以上各校军训情况，东北大学成绩获第一名。7月，农学院农艺系、园林系、垦牧系，工学院纺织系，理学院生物系停办。文学院添设史地学系及女子家政专修科。9月，学校租东总布胡同10号旧俄文专修馆址，为补习班学舍。文、法两院分设，以方永蒸兼任文学院院长，曹国卿为法学院院长，

杨毓桢院长兼任交通学院院长。10月，大学委员会委员长宋子文专聘张伯苓、王维宙、刘哲为执

流亡到北平的冯庸大学组成抗日义勇军，图为在南苑机场举行誓师大会(1931年11月1日)



行委员,又公推刘哲为执行委员代表,计划学校事宜。11月,国民党政府第174次政治会议通过补助东北大学设备费每年2万元,以10年为限。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旨在侵吞我国华北的一系列事件,而南京国民党政府却一再退让,并准备于12月9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组织发动了“一二·九”学生抗日爱国运动,在其他学校师生受军警围困,未能及时到达的情况下,东大师生冲破手持大刀의军警包围,孤军出动,从崇元观到西四北大街,再到东交民巷,他们冒着严寒,一直坚持到夜晚,成为斗争中的主力和先锋。尽管有人被捕,有人受伤,但学生们仍然顽强斗争,紧接着又举行了“一二·一六”

示威游行。东北大学体育专修科音乐教师阎绍璩(阎述诗)也亲身经历了这次斗争,他为光未然的诗作《五月的鲜花》谱曲,将他在“一二·九”运动中的真实感受,化作悠远的旋律:“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埋了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地抗争不惜……”这首从东大校园唱出的歌一问世,就在抗日民众中引起强烈共鸣,迅速传唱。

华北局势危在旦夕,“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各大学于是纷纷准备外迁。1936年初,张学良校长在西安西门外选定陕西省立农林职业专科学校旧址为校舍,东大工学院及补习班率先迁往西安,成立西安分校。2月24日,西安分校正式上课。

1936年,“一二·九”运动一周年那天,西安一万多名青年学生,举行了以“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为中心内容的请愿游行。东北大学西安分校的学生,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高呼:“枪口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打回老家去!”等口号,在向陕西省主席邵力子请愿未达到目的的情况下,冲出军警戒严的中山门,高唱救亡歌曲,向临潼进发,向正在那里的蒋介石请愿。蒋介石下令堵截学生,武装镇压,格杀勿论。张学良校长深恐学生遭到伤害,驱车追上学生请愿队伍,劝阻学生返回校园。



参加上海自卫战的冯庸大学义勇军女战士在射击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西安事变以后，张学良失去自由。1937年1月，南京国民党政府委任臧启芳为代校长，根据国民党政府南迁东北大学的指令，在开封河南大学内设东北大学办事处，东北大学迁到开封。同年5月，东北大学改为国立，臧启芳来西安接收西安分校。6月，开封学生迁到西安，集中办学。

1938年春，日军轰炸西安，东北大学不得不再度迁校，由陕入川。1938年3月中旬，流亡西安的国立东北大学南迁入蜀，以三台县城东街唐代杜甫客居的“梓州草堂”和清末潼川府属八县联立中学为校舍。迁川东北大学辖文、法2学院5系，教职员86人，学生283人。臧启芳于1939年7月继任校长，几经扩建，1942年有文、理、法、商4学院11系，学生713人，教授38人、副教授9人、讲师8人、助教21人、客座教师8人，职员84人。有著名学者蒙文通、高亨、陆侃如、冯沅君、赵纪彬、萧一山、董每戡、姜亮夫、金毓黻、丁山、叶丁易、陆茂德、杨向奎、杨荣国、姚雪垠等。东北大学首创东北史地经济研究所、东北问题研究社，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三台分会（后扩为川北分会）。1942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令改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为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毕业授予硕士学位。这一时期东大编印学术刊物《东北集刊》、《志林》，收录了师生数百万字的论文，研究课题从“大学精神”到“儒家政治思想的发展”；从“三台物价”到“东北人口发展的特点”，内容广泛。学校学术研究风气浓厚，学生活动蓬勃开展。学校通道两旁一直延伸到大门口的壁报都是学生的创作，以宣传抗日，抨击腐朽政治，揭露社会黑暗为主要内容。“学声”、“黑土地”等社团聚集了一批热血青年，成为进步学生成长的摇篮。学生剧团不仅在校内演出，还走出校门，举行义演，所得款物，捐赠前线，支援抗战。

在三台这座川北小城，东北大学度过了8年时光，在物力、财力窘迫的岁月里，师生们直面困苦，笑对艰难，追求学术发展，传播进步文化。那段日子因此而熠熠生辉，三台小城，因而平添万千气象。

1945年8月14日，东北大学师生与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抗战胜利的曙光。在抗日战争中，有60位东大人奋勇向前，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被授予烈士称号。

1946年东北大学师生从三台陆续返回沈阳，1947年2月在北陵原校址复学。1948年6月，国民党在东北战场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命令东北大学再迁北平。1993年，东北大学在沈阳恢复原校名。

东北中学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相继沦陷。东北各界爱国志士于9月27日在北平旧刑部街奉天会馆成立了“民众抗日救国会”，北京社会局在西单皮库胡同设立了难民收容所，